

浙西南革命精神的

□李庆刚 任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红色血脉，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地处浙西南的丽水是全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的地级市，红色资源丰富密集，红色传统底蕴深厚，红色基因生生不息。追根溯源，在于这块热土上的中国共产党人书写了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红军主力长征后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利，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为牵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党中央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区陷入敌人重围，经浴血奋战，仅少数突围。此时，中央红军已转移至贵州，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正在召开。先遣队以自身的牺牲策应保证了中央的安全。

1935年1月，根据中央命令，先遣队余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任务是：“经过闽北到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牵制大批的敌人。”此时，先遣队总共只剩下538人。尽管困难重重，但粟裕、刘英还是按照中央命令迅速完成组建工作，毅然直驱浙江，并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根据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因为：第一，浙西南处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与闽东、闽北和赣东北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可以互为支援。同时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为红军所利用，便于各个击破。第二，与其他老根据地一样，浙西南大部分是山区，仙霞岭一带的交通尤为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游击。第三，浙西南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国民党也意识到，红军一旦进入浙西南广大山区扎根下来，便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为此，他们先期在仙霞岭各关隘要道驻扎了众多保安团，严防死守。粟裕率领挺进师在闽浙

编者按

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丽水调研时指出，刘英、粟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曾长期在此战斗，留有多处革命遗址，值得重视与挖掘。本文系统梳理了以丽水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巩固、发展的历程，阐述了浙西南革命红旗屹立23年而不倒的主要原因，为当前丽水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活动提供了史实支撑。

边境不断调动，最终抓住战机，在斋郎烧伤敌300余人，俘获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余支，子弹万余发。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乘胜进攻，打土豪、分田地。单是松阳一县，就打击地主土豪159家，处决恶霸劣绅54人。广大群众眼看平时作威作福的反动分子被处决，情绪大为振奋，纷纷要求加入红军。粟裕回忆说，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1935年9月，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千余人。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挺进师最终建立起浙西南根据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它是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南方革命根据地纷纷收缩乃至丧失、中国革命总体上处于艰难逆境之时而诞生的第一块崭新的根据地。它的建立，彰显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新局面的奋斗精神，保存了党领导下的南方一块重要战略区域，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

与其他根据地大都处于一省或几省交界处一样，浙西南根据地处于浙江省西南部山区。不同之处在于，其他根据地大都远离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而浙西南根据地则紧贴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众所周知，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也是国民党着力打造的所谓模范省。浙西南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慑到国民党的核心区域和利益，国民党对此非常忌惮，不断发动“清剿”行动。粟裕、刘英等则采取有针对性的办法，粉碎敌人的图谋。概括来说，办法主要是：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给群众以实实在在的益处，以此扩大红军影响，揭穿国民党的政治谣言，让群众自觉地同情、拥护革命。第二，群众热情高涨之后，立即建立各种政治组织，如工会、农会、互济会、抗税斗争委员会等，第一时间把群众对革命的好感引向政治参与。第三，在根据地周围，尤其是交通要道、市镇码头，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络，防止敌人突袭。第四，敌人进攻时，毫不犹豫地转到其侧后方，或到其最痛痒的地方，绝不能固守一地。第五，化整为零，派遣游击小组，不断向外游击。第六，加强政治工作，保证思想行动绝对一致，坚决清除不良习气。

创业艰难百战多。挺进师智勇双全，以一当十，粉碎了国民党的数次“清剿”，浙西南根据地一步步巩固壮大起来，成为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这一红色堡垒，打击、吸引、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在两次反“清剿”战争中，就先后吸引国民党罗卓英、刘建绪部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8个月之久。这很好地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红色堡垒，搞得国民党长期如坐针毡，如鲠在喉，被动不堪，但却让浙江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响，了解认同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为后来浙西南和浙江的解放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红

色堡垒，培养造就了以粟裕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干部队伍。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他们仍然冲锋在前发挥了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

革命红旗始终不倒

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浙西南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支部。1927年10月，浙西南第一个中共县委即遂昌县委成立。到1928年，浙西南已有遂昌、宣平、缙云三个县委和七个区委、数十个支部，党员近700名。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7月遂昌县委领导了梭溪暴动，1930年1月缙云县委领导了黄余田暴动。暴动虽然失败，但革命淬炼的星星之火却播散在浙西南大地上。1930年5月，红十三军在永嘉县成立，下辖三个团共4000余人，并攻克缙云县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多次派兵“清剿”，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红十三军一直坚持斗争。

1935年挺进师进入浙西南，革命力量形成合流，很快站稳了脚跟，开拓出新局面。国民党重兵卷土重来，步步紧缩包围圈。挺进师面对强敌，浴血奋战，随着人员不断牺牲减少，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又缩编为小队。到最后只剩下数十人，仍与敌周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浙江省委迁至丽水，丽水成为党在浙江的中心区域。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重兵集结在浙江，但丽缙永武人民游击支队、松宣遂人民游击支队和各县武工队等党领导下的多支武装，仍高举旗帜坚持斗争，最终迎来革命的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因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够做到红旗一直不倒的为数不多。但从1926年到1949年浙西南革命红旗却屹立23年而不倒，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于党的坚强领导。挺进师主要领导人之一、全面抗战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总结指出：“只要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的严重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的恶劣，如能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与万众一心，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上下一致的团结，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与顽强的坚持斗争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浙西南革命得出的历史结论。

第二，在于群众路线贯彻得好。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前，中央就特别要求整顿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按照中央要求，粟裕规定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写五条标语，找10个群众谈话。部队到驻扎地，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十里八方的民众被红军感染，于是口口相传，鱼水之情分外融洽。民众支持，军民融合，成为浙西南革命的一个突出特色。

第三，在于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浙西南四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煜、张麒麟，为革命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前浙江在册革命烈士达7000余人，其中浙西南烈士占了很大比例。粟裕曾指出：浙西南子弟兵，觉悟很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英勇献身。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浙西南畲族同胞没有出过一个叛徒。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给予特别赞誉。这些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值得我们永远缅怀铭记。



“四面八方”政策形成的台前幕后

□韩勤英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讲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它是毛泽东统观全局的战略思考和刘少奇细致入微的城市调研之间擦出的思想火花，是面向全国人民交上的一份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答卷”。

解放战争后期，石家庄、天津、北平等华北大城市先后解放、接管，接连暴露出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民族工商业家不了解党的工商业政策，普遍有生产恐慌，工人片面理解党的政策，加之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经济下滑严重。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警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3月下旬，党中央迁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成为毛泽东的新住所和党中央筹建新中国的决策中枢。4月，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正待乘胜一路南下，总结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城市政策，为稳妥接管南方大城市提供经验，更加迫在眉睫。中央书记处每天晚上都集中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4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赴天津调研。临行前不忘将一份反映平津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批转刘少奇，刘少奇对解决天津问题有了底数。

天津当时是华北最大的工商城

市，成为接管后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改造工商业城市的“试验场”。4月10日晚，刘少奇到达天津。第二天一大早，他急切地赶到几家工厂考察，听取天津市领导工作汇报。连续召开工人、民族工商业家等各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外事外贸工作汇报，更加印证了报告中的事实：不少民族工商业家思想上顾虑深重，感到发展生产没有出路；工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战争造成的城乡联系中断、内外贸易阻滞问题亟待恢复。当天晚上，他熬夜写下《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鲜明地指出：“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这里有个小插曲。刘少奇到天津临行前，曾专门到华北局机关向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打招呼。到天津后，他严格按照组织程序，一般情况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重要问题通过薄一波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党中央指示也由华北局转达。4月中旬，当薄一波将刘少奇讲“四面八方”关系情况转报毛泽东时，毛泽东当即给予肯定，认为讲得很好，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完整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个字。

4月15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亲切接见了来北平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大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笪一行三人。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没有讲政治、军事形势，而是兴致勃勃地畅谈经济问题：“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接着，毛泽东就其中的四个面、每个面的“两方”，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四面八方”缺一

打造网络空间安全的“生命线”——以“融创引育”加强网信部门支部政治建设

□孙蔚敏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深刻影响和冲击，网络空间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网信部门作为加强互联网管理的一支重要的技术保障力量，始终奋战在守护党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前线，必须时刻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高对网信部门支部建设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实际举措进一步增强网络空间斗争的凝聚力战斗力。

网信部门党支部是做到“两个维护”、开展网络空间斗争的战斗堡垒。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保障工作政治敏感性强、对抗压力大，必须保证这支队伍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有战斗力，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这就需要在提升组织力，强化政治功能上下功夫，在支部层面把践行“两个维护”作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切实增强维护核心的自觉，坚定维护核心的信念，提高维护核心的能力。

网信部门党支部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单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网信领域技术单位一般专业技术人才多，学历普遍较高，年轻人占绝大多数，思想活跃，工作中长期接触网上各种信息，加之缺乏政治历练，其思想问题要引起充分重视。必须从党员干部实际出发，通过坚持把支部建在处室，甚至在临时项目组，要求支部书记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以提高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把思想政治工作做细做深。

网信部门党支部是推动核心技术突破的高效集合。网络安全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技术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网信部门承担着用技术管网治网的重要保障职责，常常是在实战中创新、在对抗中攻关，必须通过有效组织，将核心技术攻关与业务实战协同促进。因而需要凸显基层党

建的组织优势，让技术攻关在保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时，与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有机结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核心技术突破与制胜。

在具体工作中，要从“融创引育”四个方面着手，强化支部政治建设，以突出政治功能强化业务效能，不断提升组织力强化战斗力，打造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生命线”。

一是以“融”字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做到上下融合，领导班子成员定期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并结合分管工作讲党课，讲“网信人的初心和使命”“‘四个自信’与网络治理”，以此联系群众，做到工学融合。瞄准党建“工学矛盾”难题，在支部建设中将技术业务能力提升作为规定动作，在科研技术业务中将党性修养作为必要前提，在评价标准中明确支部党建与业务尖兵同步考核；同时发挥技术单位优势，积极探索“数字党建”管理模式，从理论学习、关键时刻的表现、工作作风、技术业务管理能力、团结协作和斗争能力等方面尝试用数字进行描述和管理，运用互联网思维将支部建设工作运营起来，做新做深。做到虚实融合，以科学务虚带动科学务实，要求既发挥出科研团队务实求真的自身特质，又注重思想理论方面的务虚交流，保证日常工作在思想层面有基础、有后盾、有支撑。

二是以“创”字确保支部党建引领重大项目。坚持工作开展到哪里，支部就建到哪里，在重大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临时党支部建在项目组上，形成工作惯例，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鼓励各支部守正创新，为模范支部举办观摩课，以通俗生动的内容，让党员干部听得懂、受启发。以支部建设激发组织活力。针对“网络”和“青年”的特点，充分给予各支部自主空间，激发党员主体活力，打造出“红色周末”“党性拓展”“自学杂志”

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

此时，仍在天津调研的刘少奇，获悉毛泽东的“十六字”指示，立刻心领神会，照此阐述和宣传。他按照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表述口径，两次与李焯尘、宋斐卿等华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谈，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在态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5月1日，北平迎来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数十万职工举行庆祝游行活动，载歌载舞，欢度节日。市委书记彭真来到工人中间，号召全体职工以实际行动庆祝节日，坚决拥护毛泽东所指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工商业集中，外部联系广泛，接管工作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民族工商业家有的濒临破产，有的外逃，有的观望。5月27日解放后，市长陈毅按照“四面八方”政策，与工商界交朋友，扶持私营企业发展，让民族工商业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萌生回国之念，陆续回到上海。

《共同纲领》颁布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开辟专栏详细解读，党的“四面八方”政策更加深入人心。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市长叶剑英迅疾实施“四面八方”政策，稳定了城市生产。“四面八方”政策与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不要四面出击”方针一道，给民族工商业家吃了“定心丸”，提高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热情，对于解放初期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等一批支部活动品牌，以创造力形成引力、增强活力。

三是以“引”字对支部建设开展“全方位牵引”。以使命引领，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网信系统没有脱离政治的业务，也没有脱离业务的政治”，把对党忠诚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尤其在重大专项保障任务期间，注重通过“考验式实践”锤炼党性、磨砺信念。以文化引领，把思想文化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做好党性教育，构建文化价值体系，增强党员使命感、责任感。以需求引领，强调“党管人才、广纳贤才、科研助才”，把党员个人发展需求与单位科研创新需求有效对接，在重大项目上向青年人才打开大门，不搞论资排辈；在人事制度上建立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双通道”职业发展模式，为专科研的技术人才建立专门的职业和待遇发展通道，形成复合激励；设立“青年科研基金”等平台，优化创新环境。

四是以“育”字培养支部“成长性”。育人才，以人为本营造重视青年人才氛围，着力培养新时代“又红又专”网信人才，既有红色基因，又有专家素养；培养“学中创、创中学”的创新型人才，鼓励在工作中探索学习新技术、新理念、新做法；培养既懂管理又精业务的复合人才，形成一批有能力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中坚力量。大力发现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通过制度化安排将年轻骨干选派、挂职到地方基层一线岗位培养锻炼。育认识，建立“加油站”，通过建设“学习书院”，增强日常学习的专业性和支部活动政治仪式感，利用办公OA系统、移动APP等信息化平台，形成讲政治的浓厚氛围，使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

